

# 全球智库半月谈

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驶向悬崖

欧盟不应在贸易问题上迎合特朗普

关于阿根廷债务危机的讨论

中国 17 年来经常账户首次逆差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数字经济市场

敌我外交时代的能源政策

本期编译

曹园

丁丽伟

刘铮

单敬雯

史明睿

申劭婧

唐雪坤

伊林甸甸

杨茜

张寒堤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mailto: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mailto: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 目 录

## 世界热点

## 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驶向悬崖..... 7

导读：委内瑞拉经济恶化、社会动荡，不仅债务违约，石油生产和出口也陷入了恶性循环。本文认为，持续资金短缺的委内瑞拉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更多的违约风险可能会在2018年第二季度显现。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 欧盟不应在贸易问题上迎合特朗普..... 10

导读：美国政府近期在贸易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得欧盟面临艰难的抉择。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来之不易的国际贸易秩序遭到颠覆，欧盟应该采取果断而坚决的反制措施。这不仅出于欧盟自身的考虑，更是为了全世界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

## 解构 CEA 对美国减税溢出效应的估计..... 14

导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Kevin Hassett 最近声称，美国减税通常会对美国以外经济体的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使用实证文献中的标准方法，研究税收变化的国际溢出效应，结果发现 Hassett 的论点没有统计基础。

## 关于阿根廷债务危机的讨论..... 18

导读：此前，阿根廷总统 Mauricio Macri 领导的政府向 IMF 寻求贷款，本文为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对这一行为的观点汇总。学者和研究机构对阿根廷总统的政策褒贬不一，部分观点肯定 Macri 的经济政策，但也有观点认为向 IMF 寻求贷款帮助是一种倒退，总统的经济政策成效不大导致投资者对阿根廷失去信心。

## 聚焦中国

## 中国 17 年来经常账户首次逆差意味着什么？..... 20

导读：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经常账户 17 年来首次出现逆差，这再次提醒着我们，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正在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本文总结了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看法。

## 中国的数字经济市场..... 24

导读：在中国数字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的强势崛起下，中国引领了全球数字创新的风潮。但是中国数字经济市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本文运用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中，创造的附加值和就业岗位为衡量指标，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与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数字经济水平进行对比。

## 经济政策

### 张涛：如何确保亚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策缓冲、货币政策框架与金融包容性 ..... 28

导读：对于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亚洲各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IMF 副总经理张涛在第五届 MAS 亚洲货币政策论坛上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亚洲需要共同努力来建立能够应对意外风暴的政策缓冲机制，警惕通胀并加强货币政策框架和中央银行的沟通，并且努力实现更广泛的金融包容。

### 敌我外交时代的能源政策 ..... 32

导读：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外交中保持一种亦敌亦友的姿态，而一定程度上，能源问题是其在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中的重要部分。本文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新外交时代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动和特朗普政府的新能源政策。

## 战略观察

### 朝鲜：川普能创造历史吗？ ..... 36

导读：在 4 月 27 日举行的首脑会晤上，朝韩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开启了半岛和平的新旅程。随后，举世瞩目的“特金会”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对于当前的半岛局势，各方态度如何，“特金会”的举行又带来怎样的成果，本文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 充分利用朝鲜的复杂动机 ..... 40

导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 5 月 10 日宣布，他期待已久的与金正恩的会面将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金正恩近期的外交政策突变备受世界关注，本文作者认为，金正恩这种转变背后的动机是多样化的，但美国应该充分利用本次机会，引导朝鲜与之达成广泛协议，并且可以考虑进一步发展为两国军事互信与合作。只要朝鲜信任美国，其将受益匪浅。

### 可望而不可及：国务卿蓬佩奥关于伊朗的演讲 ..... 43

导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1 日在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进行演讲，阐述了美国在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后新的对伊战略，并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的 12 项要求。作者认为，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伊朗核计划的范围，并对伊朗政权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没有更多谈判选项和奖惩措施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一无所获。

### 在惊人的选举之后，马来西亚将会改变多少？ ..... 45

导读：5 月 9 日，马来西亚议会选举结束，92 岁高龄的前总理马哈蒂尔重出江湖，带领反对派希望联盟爆冷击败国民阵线，赢得议会选举，将成为下一任总理。本文作者认为，马哈蒂尔的胜利是马来西亚民主的一个重要时刻，意味着反对派有可能赢得与长期执政党派的

对垒，这将给马来西亚国内及地区国际局势带来一些影响。但另一方面，作为前总理纳吉布的前盟友，马哈蒂尔与前对手安瓦尔的合作，即使给马来西亚带来激烈变革，能否成功也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本期智库介绍 ..... 48

## 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驶向悬崖

Frank A. Verrastro 和 Andrew J. Stanley /文 单敬雯/编译

导读：委内瑞拉经济恶化、社会动荡，不仅债务违约，石油生产和出口也陷入了恶性循环。本文认为，持续资金短缺的委内瑞拉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更多的违约风险可能会在 2018 年第二季度显现。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只会继续恶化。编译如下：

去年 12 月，委内瑞拉经济严重恶化，社会动荡，这似乎预示着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将失去统治地位。由于缺乏收入，委内瑞拉一直处于违约的边缘，并最终违约，其石油生产和出口也陷入了恶性循环。上周末（5 月 20 日），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赢得本次选举，然而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认可此结果。参加 G20 阿根廷峰会的美国和其他地区领导人严厉谴责了这次投票，并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不过古巴、俄罗斯和中国对马杜罗的胜利表示了祝贺。选举结果公布后，特朗普政府立即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旨在禁止美国公民和/或公司购买委内瑞拉政府（包括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的债务或应收账款。而在此前，加拉加斯一直在抛售债务以筹集应急资金。

上周末（5 月 26 日）美国传教士乔舒亚·霍尔特意外获释，这大概是马杜罗政府的一种善意表态，此举受到了白宫的欢迎。不过白宫仍在威胁扩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据报道称，禁止向委内瑞拉出口凝析油和成品油产品、禁止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禁止与委内瑞拉实体进行以美元计价的交易以及扩大对个人的制裁等措施都在特朗普政府的考虑范围内，不过考虑到石油价格和全球石油供应的问题，具体的时机和选项尚有缓和的机会。美国政府可能将石油制裁活动与战略石油储备（SPR）的石油释放结合起来，以缓解供给减少的压力，减轻对价格的影响。霍尔特获释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证实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没有改变”。

### 1、经济和石油产量不断恶化

去年 11 月，马杜罗总统宣布该国有意对其债务进行重组，并任命副总统塔里克·埃萨米（涉嫌贩毒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担任重组委员会的负责人。截至本月中旬，标普全球评级已经将委内瑞拉政府债券的发行评级从 CC 下调至 D，并宣布委内瑞拉处于“选择性违约”状态。尽管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报道称，该公司借给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贷款仍继续按期偿还，但

中国似乎并不打算延长委内瑞拉 190 亿美元债务的两年偿还宽限期。去年秋天，俄罗斯重组了向委内瑞拉提供的约 30 亿美元贷款。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尽管有几家银行和投资者/债权人已经开始探索各种选择和进一步的措施，但大多数债权人基本上还是按兵不动（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冲销巨额损失）。在外交救济方面，上个月，利马集团 14 国再次对马杜罗的强硬手段和他对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处理方式表示了谴责（该国内通胀率激增 17000%，医疗、饥饿和难民问题危机重重），但并没有提供切实的行动计划。长期以来，资产扣押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特别是 PDVSA 旗下的 CITGO，但是由于 CITGO 的股票此前曾被抵押以换取贷款，因而债权人的分类和状态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尽管如此，上周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已经根据国际贸易法庭的裁决开始采取行动，接管了 PDVSA 在加勒比地区的炼油和产品资产，作为 2007 年委内瑞拉夺取康菲石油资产的补偿。特别地，康菲石油公司已经把库拉索的 Isla 炼油厂以及阿鲁巴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博奈尔岛的大型储存和运输设施作为目标。虽然委内瑞拉对这一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对这些炼油和储存资产的没收和没收威胁正在影响油轮货物的装卸，导致船舶改道，并可能影响到岸上的生产和基础设施的交付。因此，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很可能仅限于何塞港（Jose）、拉克鲁斯港（Puerto la Cruz）和巴霍格兰德（Bajo Grande），并会因此引发物流、装载甚至生产问题以及导致交易成本增加。

或许更重要的是，康菲石油公司的裁决可能预示着其他债权人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例如，加拿大 Rusoro 矿业公司已经在寻求仲裁，其他债权人正在组织索赔行动）。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一些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和服务公司已经有效地停止或大幅减少了持续的现金投资，对一些项目采取大规模的资产减记，这导致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急剧下降（因为该国超过 75% 的石油产量来自于合资企业），加剧了形势的恶化。缺乏投资、人力损失和运营维护的中止导致了工厂的强制关闭和普遍的安全问题。

去年年底，在财政和人道主义方面，马杜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拘捕多名 PDVSA 高级官员以及 CITGO 的代理 CEO 佩雷拉。马杜罗随后任命了没有任何能源经验的查韦斯的亲信曼纽尔·克维多负责能源业务，以根除 PDVSA 的腐败问题。总统的军事支持者越来越多地进入了 PDVSA 的管理层，在产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巩固了政府的控制。上个月，根据总统令，克维多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可以重组 PDVSA，并同包括雪佛龙、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道达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内的国际合资伙伴重新进行谈判。

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和精炼的减少导致了产品短缺，需要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进口稀释剂（与重质原油混合用于加工和运输）、柴油和汽油。据报道称，最近稀释剂的货运也是来自于伊朗和伊拉克。钻井数量下降，原油产量目前低于 1.4 百万桶每天（mbd），为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仅去年一年就下降了约 45%。预计 2018 年进一步损失的范围在 300-500 mbd 之间，如果情况加速恶化，可能会损失更多。

因此，原油出口也大幅下降。在过去的一年中，运输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原油量下降了近 40%（下降至不到 450 mbd），美国炼油厂商正积极寻求委内瑞拉以外的原油进行替代，以满足其炼制需要。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也在减少，主要原因是 PDVSA 原油产品质量恶化。截至今年 2 月（美国能源信息署提供的最新数据），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中，超过 90% 都是运往国内少数的几家炼油厂。同期，从加拿大进口的石油量出现了显著增长。

## 2、OPEC 市场动态

由于石油需求增长强劲，再加上 OPEC 及非 OPEC 联盟关于减少石油供应、消除全球库存负担的持续承诺和行动，以及与石油供给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或在叙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委内瑞拉和波斯湾的政治挑战的加剧，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明显缓解并很可能矫枉过正。在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同意放宽目前 OPEC 及非 OPEC 国家的冻结协议之后，油价在过去一周有所缓和，但布伦特原油价格仍徘徊在 80 美元/桶附近（接近多年高点），美国汽油价格也在快速上涨。包括美国和印度在内的主要消费国警告 OPEC 成员国，价格进一步上涨将危及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成员联盟将在下个月的维也纳会议中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过去油价的上涨为委内瑞拉提供了经济动力，但当前产量和出口的急剧下滑却让这种收入的增加无法改变委内瑞拉的命运。总结而言，持续资金短缺的委内瑞拉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更多的违约风险可能会在 2018 年第二季度显现。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

本文原题为“Venezuelan Oil Supply: Careening Toward the Cliff”。本文作者 Frank Verrastro 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的高级副主席，Andrew Stanley 是 CSIS 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的助理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5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欧盟不应在贸易问题上迎合特朗普

Maria Demertzis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美国政府近期在贸易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得欧盟面临艰难的抉择。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来之不易的国际贸易秩序遭到颠覆，欧盟应该采取果断而坚决的反制措施。这不仅是出于欧盟自身的考虑，更是为了全世界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全文如下：

从突然征收惩罚性关税，到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定，特朗普近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策都堪称是史无前例。那么，究竟谁才能从美国的这种行径中受益呢？这些政策当真能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吗？而欧盟作为美国事实上最大的战略盟友，又应当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美国目前抛出的的是一个典型的“懦夫博弈”（game of chicken）式的局面，而欧盟在做出应对前，必须做出谨慎而全面的分析。

毋庸置疑，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几乎是全世界最为重要的经贸关系。如果美国（US）和欧盟（EU）携手合作（cooperate），共同推动建立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那么双方都能够从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受益。但是，如果其中一方进行贸易制裁（sanction），则其可以单方面获得更多的贸易红利。如果双方同时长时间进行贸易制裁，则国际自由贸易将走向终结，双方皆损失惨重。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描述在图 1 的效用矩阵中。

**Table 1: Matrix of Pay-outs**

	EU	Cooperate	Sanction
US			
Cooperate		1,1	0,2
Sanction		2,0	-10,-10

**图 1 纯策略博弈的效用矩阵（对称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矩阵中的数字并不对应实际的经济回报，也不反映其真实的偏好关系。从图中的效用关系我们可以得知：

- 对于双方而言，共赢的局面是双方共同开展贸易，双方效用为（1,1）；
- 其中某方确实有单方面偏离均衡，单独进行贸易制裁的冲动，但是这必须建立在预计对方不会同样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前提下，双方对应的效用为（2,0）或（0,2）；
- 贸易体系崩溃带来的恶劣结果是双方皆不愿意看到的，对应效用为（-10,-10）；

显然,在这种模型设定下,美国只有在确信欧盟不会跟进贸易制裁的前提下,才能从单方面制裁中获益。现实世界当然没有这么单纯,因为双方都可能采取混合策略,而非图 1 中的纯策略。笔者在图 2 中推导了混合策略下双方选择各种策略组合的概率。(感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在原文网站的附录中找到技术细节) 这些结果意味着:

**Table 2: Mixed strategies, matrix of probabilities**

	EU	Cooperate	Sanction
US			
Cooperate		$(10/11) * (10/11) = 100/121$	$(10/11) * (10/11) = 10/121$
Sanction		$(1/11) * (10/11) = 10/121$	$(1/11) * (1/11) = 1/121$

图 2 混合策略博弈的效用矩阵 (对称假设)

- 双方皆选择双赢策略的概率高达 100/121。换言之,在一般情况下,尽管都有偏离这一均衡的动机,但双方都认同自由的贸易秩序是有利可图的;
- 最坏的假设成真的概率是相当低(1/121)的,因为双方都认为以邻为壑、壁垒高筑的贸易格局是损人不利己的;
- 但是,这种最坏的假设并非不可能发生。因为现实世界中在双边贸易里受损的一方往往会进行报复;
- 最后,虽然单方受益均衡的概率并不高(2\*10/121),但这也并非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考虑到如上博弈是重复进行的,我们会发现,美国(或欧盟)将从“咄咄逼人”的形象中受益。但是,如果双方都是如此,则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丰富这个模型的细节。多年以来,特朗普一直长篇累牍地宣称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限制自由贸易则会使美国从中受益。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法结合到模型当中,即:美国认为制裁带来的最坏结果对其而言损失是较为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将最坏情况里美国的损失缩小(比如从-10改为-1)。笔者在图 3 中描述了这种假设下纯策略博弈的效用矩阵,而图 4 则展示了混合策略博弈的情况。

**Table 3: Matrix of Pay-outs with current US trade policy**

	EU	Cooperate	Sanction
US			
Cooperate		1,1	0,2
Sanction		2,0	-1,-10

图 3 纯策略博弈的效用矩阵（非对称假设）

在这种假设下，双方各有多大可能选择制裁呢？笔者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选择制裁的概率由先前的 1/11 猛增至 1/2！（技术细节见原文网站的技术附录）这意味着，美国反复强调其不害怕打贸易战，将逼迫欧盟采取更多对应的制裁措施。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做出错误选择的概率将大为增加，而国际贸易秩序走向解体也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更为有趣的是，美国选择制裁的概率与先前相比并未改变。

Table 4: Mixed strategies, matrix of probabilities with current US trade policy

EU	Cooperate	Sanction
<b>US</b>		
Cooperate	$(10/11) * (1/2) = 10/22$	$(10/11) * (1/2) = 10/22$
Sanction	$(1/11) * (1/2) = 1/22$	$(1/11) * (1/2) = 1/22$

图 4 混合策略博弈的效用矩阵（非对称假设）

图 4 中新的效用矩阵意味着：

- 双赢局面的概率在如今的假设下不足一半（只有 10/22）！这与先前 100/121 的概率相比无疑是重大的下降。
- 欧盟选择制裁以进行回应的概率相比先前也大为上升；
- 双方同时进行制裁的概率从先前的 1/121 猛增至 1/22，全球贸易秩序的终结不再是天方夜谭！

“懦夫博弈”（game of chicken）模型启示我们，如果你的博弈对手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则加以反制是最正确的做法。这意味着，随着美国发出挑起贸易战的威胁，欧盟必须进行有效的反击，且这与美国是否真的认为其将从自由贸易的终结中受损较少无关。但是，这也意味着来之不易的国际贸易秩序面临现实而严重的威胁。

因此，美国政府目前不负责任的行为绝不仅仅是某个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问题，而是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严重挑战。笔者认为，欧盟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应对：

首先是做好迎战准备。欧盟应该切实研究能够有效打击美国在欧经济利益的方案，并加以准备；

其次，欧盟当局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声，凝聚“国际贸易合则两利，败则两伤”的共识，这将有希望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并调整其现行政策；

最后，欧盟一向视自己为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捍卫者。因此，欧盟应该在采取强硬措施，迫使美国回头是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从而确保来之不易的国际贸易秩序不受颠覆。

总而言之，在维系国际贸易秩序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欧盟绝不应该屈服于特朗普的想法，而应该挺身而出，维护自己及世界的共同利益。

---

本文原题为“The EU Should Not Sing to Trump’s Tune on Trade”。本文作者 Maria Demertzis 为欧洲智库 Bruegel 研究院副院长。在加入 Bruegel 前，她曾先后供职荷兰中央银行研究局以及欧盟委员会，并有大量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本文于 2018 年 5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解构 CEA 对美国减税溢出效应的估计

J r mie Cohen-Setton 和 Egor Gornostay /文 杨茜/编译

导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Kevin Hassett 最近声称，美国减税通常会对美国以外经济体的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使用实证文献中的标准方法，研究税收变化的国际溢出效应，结果发现 Hassett 的论点没有统计基础。编译如下：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 Kevin Hassett 最近声称，美国减税通常会对美国以外经济体的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使用实证文献中的标准方法，研究税收变化的国际溢出效应，结果发现 Hassett 的论点没有统计基础。

Hassett 在 4 月 23 日的讲话中声称 CEA 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

CEA 内部分析发现，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外生性税收变化会对全球增长产生巨大影响。将 Romer&Romer 外生性税收冲击序列应用于全球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美国税收占 GDP 的比例减少 1%，会导致欧盟的 GDP 在接下来一年增长 0.8%，2 年后达到 1.2% 的峰值。我们可以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零效应的原假设。此外，我们估计减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甚至更大，在 2 年后达到 2.1% 的峰值，无论是 1 年还是 2 年，我们同样可以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由于美国仅占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对全球 GDP 的税收乘数为 8。这一数字是非同寻常的，因为税收乘数的范围通常在 0 到 3 之间。

因为基础分析尚未公开，我们无法准确地复制 CEA 的研究。然而，CEA(2018) 很明显使用了 Romer&Romer (2010) 税收冲击序列。根据美国政府官方文件、总统演讲和国会文件，Romer&Romer 确定了 1947 年至 2006 年期间共计 110 个单独的税务变化。其中，这些变化中有 70 个“不受当前或预计的经济状况的驱动”（Romer 和 Romer 2007），因此不会出现反向因果关系，这使得他们研究税收变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是有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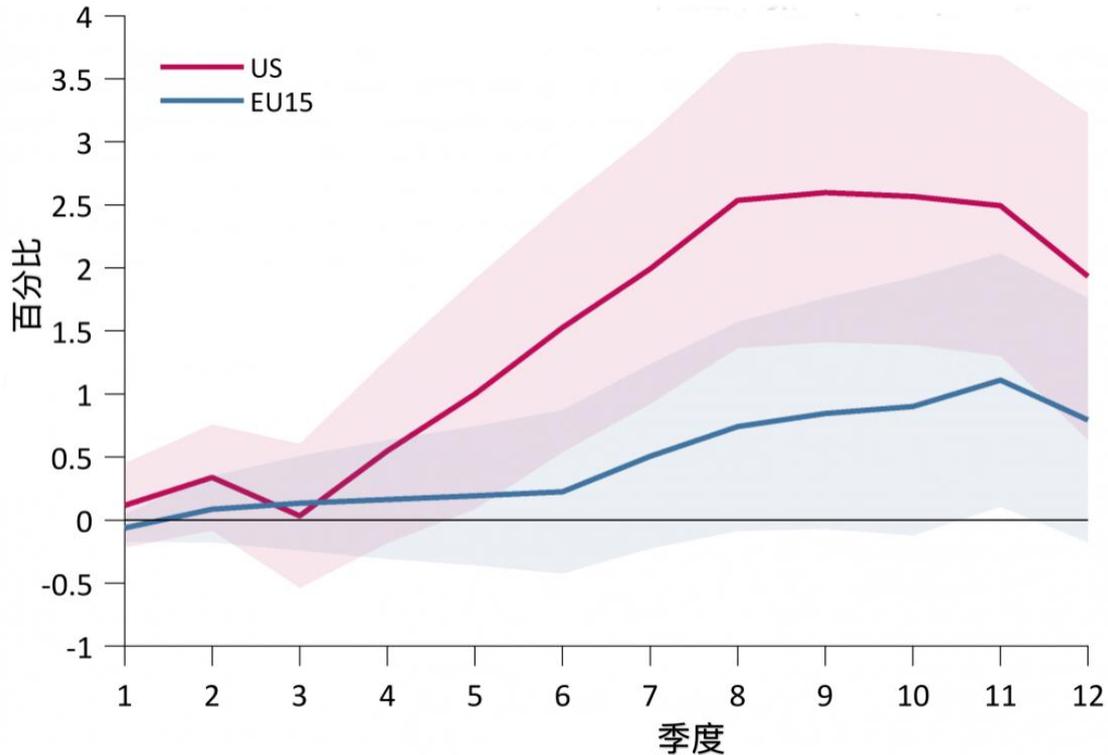
使用这一外生性税收冲击序列，并遵循 Romer&Romer(2010) 的实证方法，我们将实际产出增长对一个常数，外生性税收变化的同期和滞后期以及实际产出增长的滞后期进行回归。也就是说，我们估计：

$$\Delta Y_t = a + \sum_{i=0}^N b_i \Delta T_{t-i} + \sum_{j=1}^P c_j \Delta Y_{t-j} + e_t,$$

其中 Y 是美国或欧盟实际 GDP 的对数，Δ T 是美国外生性税收变动的测度， $e_t$  是一个扰动项。我们选取从 1961—2006 年 GDP 的季度值（无法从 OECD 获得欧盟 15 国早期的季度实际 GDP 数据）。允许税收冲击的影响最多为 12 个季度

的滞后 ( $n=12$ ), 并且通过将过去的实际产出增长 ( $P=12$ ) 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产出增长的动态。利用局部投影法估计脉冲响应函数。

图 1 美国税收减少 1% 的 GDP 对美国 and 欧盟 15 国增长的影响(使用 Romer & Romer (2010) 税收冲击序列)



来源: 作者计算和 Romer & Romer (2010)

图 1 显示了美国税收减少 1% 对美国 and 欧洲实际 GDP 相对于正常值 (取对数) 的累积影响以及一个标准误差带。对于美国而言, 美国减税对美国 GDP 影响的程度和形态与 Romer & Romer (2010) 的最初发现非常相似。在减税发生的季度和接下来的三个季度, 其影响很小且统计上没有意义。然后影响稳定增长, 在九个季度后达到 2.8% 的最大程度。

虽然这种影响对于美国来说是巨大、持续并且非常重要的, 但对于欧盟来说这个影响很小而且并不重要。事实上, 使用欧盟的 GDP 数据进行回归, 其结果显示不能以 95% 的置信度拒绝零效应的原假设。点估计的幅度也与 CEA (2018) 不同, 影响程度并不是一年后的 0.8%, 而是仅为 0.2%。最大的影响也发生在一年之后, 是唯一在 68% 置信水平下显著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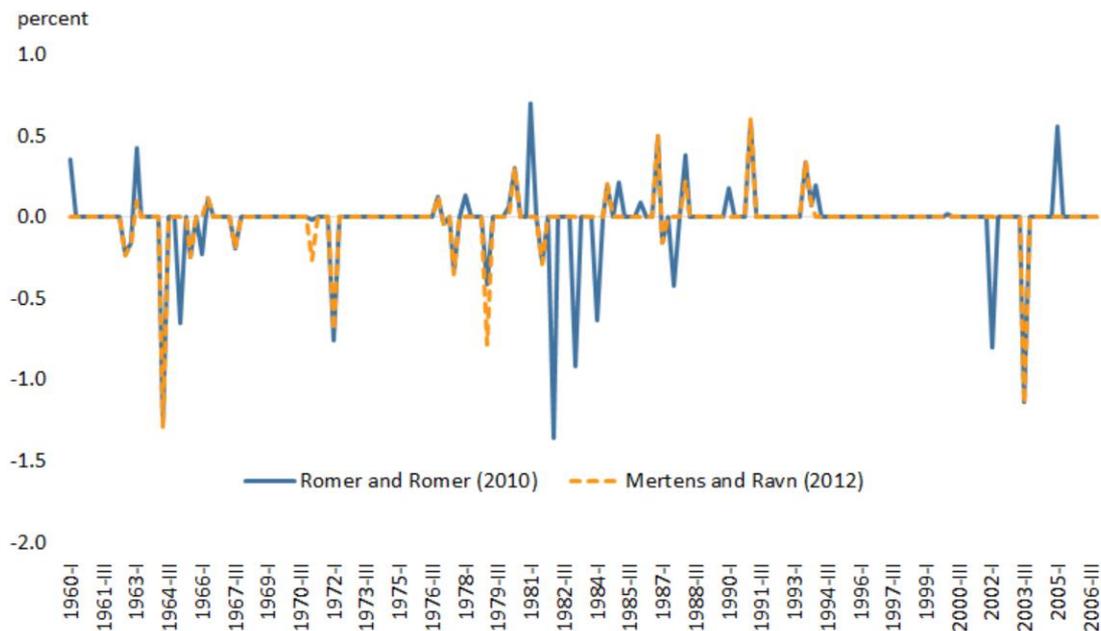
简而言之, 使用文献中的标准方法, 我们无法获得接近 CEA (2018) 报告关于美国减税的巨大国际溢出效应的任何结论。

有趣的是, 如果我们使用 Romer & Romer (2010) 的外生性税收序列的替代版本: 区分不可预期和可预期的外生税收变化, 我们可以获得更接近 CEA (2018)

的点估计，但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Mertens & Ravn 2012）。虽然有充分的理由只采用不可预期的冲击进行回归，但删除可预期的税收变化数据大大减少了我们估计依赖的外生性税收冲击的数量。因此，结果是由特定税收行为驱动的风险更大，这些税收行为可能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发生的，而不是在所有税收行为中都是稳健的。

如图 2 所示，这是使用两个税收变化序列的比较，仅仅使用不可预期的税收变化，也将里根的财政政策误认为是 1981 年仅有 0.3% 的小额意外税收减免，而不是战后美国最大的减税政策。在 Mertens & Ravn（2012）中，1982 年（GDP 的 1.4%）、1983 年（GDP 的 0.9%）和 1984 年（0.6% 的 GDP）更大的减税政策都被认为是预期的，因此不包括在回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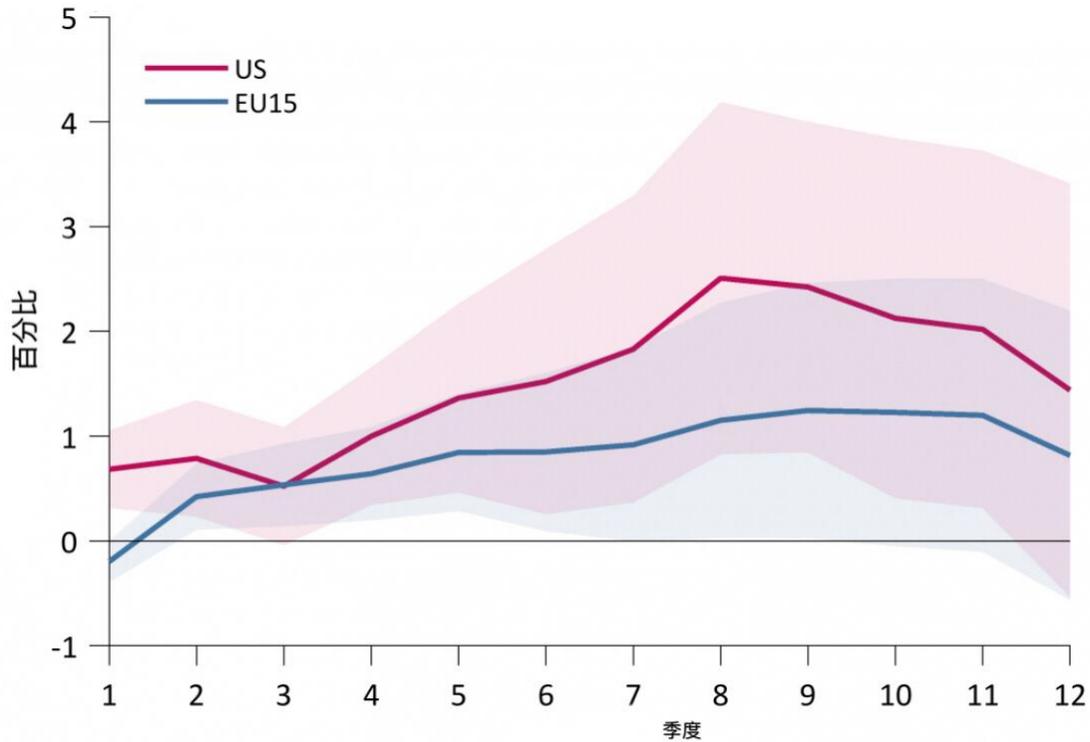
图 2 所有的外生性税收冲击(Romer & Romer 2010)v.s.不可预期的税收冲击(Mertens & Ravn 2012)



来源：Romer & Romer（2010），Mertens & Ravn（2012）的 2018 最新版本和作者计算

图 3 显示了使用 Mertens & Ravn（2012）外生和不可预期的税收冲击序列重新估算方程的结果。不出所料，美国和欧盟 15 国的标准误差范围比图 1 更宽，因为该序列包含较少的非零观测值。更有意思的是，出现了与 CEA（2018）报告中欧盟 15 国相同的点估计：一年后为 0.8%，两年后为 1.2%。然而，这些点估计值在 95% 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即使在 68% 的置信水平下，减税后第一季度的影响在统计上也并不显著。

图 3 美国税收减少 1% 的 GDP 对美国 and 欧盟 15 国增长的影响(使用 Mertens & Ravn(2012) 税收冲击序列)



来源: Romer & Romer (2010), Mertens & Ravn (2012) 的 2018 最新版本和作者计算

CEA 表明他们的结果来自更复杂的向量自回归, 这可以解释与我们结果的一些差异。然而, 标准多变量方法与标准的单变量方法相比, 会产生显著不同的结果令人惊讶。通常, 这两种标准方法给出了可比的点估计和标准误差。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CEA (2018) 提出的溢出估计是不可信的。

---

本文原题为“Deconstructing CEA Estimates of US Tax Cuts Spillover Effects”。本文作者 J r mie Cohen-Setto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教授, Egor Gornostay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研究员暨质量控制协调员。本文于 2018 年 6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关于阿根廷债务危机的讨论

Silvia Merler/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此前，阿根廷总统 Mauricio Macri 领导的政府向 IMF 寻求贷款，本文为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对这一行为的观点汇总。学者和研究机构对阿根廷总统的政策褒贬不一，部分观点肯定 Macri 的经济政策，但也有观点认为向 IMF 寻求贷款帮助是一种倒退，总统的经济政策成效不大导致投资者对阿根廷失去信心。编译如下：

Monica de Bolle 表示，总统 Mauricio Macri 领导的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向 IMF 寻求贷款）很难让人相信阿根廷在一年前还曾是金融市场的宠儿，甚至顺利发行了 100 年期限的债券。这一突然转变的部分原因肯定在于，此前人们对阿根廷有能力从 15 年的经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巨大困境中脱身抱有过度的乐观态度，而这种风向于三周前开始转变。由于担心潜在的中美贸易战会对全球产生影响，加之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美国通胀率和利率上升，投资者开始将资金撤出新兴市场。De Bolle 认为，Macri 总统的请求（向 IMF 申请贷款）旨在帮助阿根廷在不损害改革成果的前提下，在融资和改革调整之间“找到刀尖上的平衡”，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重返历史上饱受失败项目困扰的南美地区，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对于那些认为南美国家已足以彻底脱离基金组织帮助的人来说，阿根廷再次敲响了警钟。

John Cochrane 主持讨论了 Alejandro Rodriguez 的一篇冗长而详细的文章，Rodriguez 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CEMA 经济学系主任，他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市场运动和机构的反应。

Cochrane 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的阿根廷是一个测试案例，即使是 100% 的货币支持也不足以钉住汇率，因为政府不为债务背书。因此，即使是货币发行当局也无法避免财政问题引发的通胀影响。90 年代初，在经历了两次高通胀之后，阿根廷开始实施“兑换计划”——固定汇率盯住美元。这项试验持续了 10 年，直到全球美元走强与其他冲击相结合，吓跑了解决阿根廷财政赤字和膨胀债务融资所需的资金流入。2001 年 12 月，de la Rúa 总统辞职，债务违约，经济进一步崩溃。“兑换计划”结束，比索在突然贬值后开始浮动（采取干预措施）。贬值的实际汇率和繁荣的商品价格对实体经济起到了肾上腺素般的推动作用，实体经济开始增长。随后，民粹主义发生了。

Martin Guzman 认为，伴随着债务增长推动下的经济增长，阿根廷正面临一个不确定的经济前景。Mauricio Macri 政府也许能够解决阿根廷的宏观经济风险，但势必会面临艰难的选择。

为了稳定外债，阿根廷需要实现贸易顺差。要实现贸易顺差，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出口商品的产量，而不是抑制进口。虽然目标可能是明确的，但是现有政策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稳定经济的方法有两种基本策略：基于利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和逐步减少基本预算赤字（排除利息支付）。但这种政策组合引发了一些担忧。Guzman 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央行关于浮动汇率制能确保宏观经济一致性的假设，为了促进出口，阿根廷可能需要先改变其货币政策策略。

El Cronista 收集了经济学家对这一消息的反应。Martin Redrado 认为这一决定是倒退，表明政府正试图挽回失去的可信度，但却错过了与世界银行等其他多边机构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机会。Guillermo Nielsen 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但它有一种酸涩的回味，因为这表明阿根廷无法自控，政府领导能力不足，政府无法解释并领导必要的调整。Jose Luis Espert 很苛刻，称之为“渐进主义的失败”。Miguel Kiguel 也欢迎这一决定，并表示，IMF 的信贷额度将是阿根廷经济增长的最佳选择，有助于降低国家风险。他认为，众所周知，渐进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对外部融资的依赖。问题在于 B 计划（替代计划）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答案了。

Arturo C. Porzecanski 认为这一声明是承认 Macri 总统在处理民粹主义遗留问题上的渐进政策。这一声明没有对信心和市场行为产生有利的预期影响。尽管央行重新干预促使货币升值，但其对美元的购买力仍然损失了近三分之一。

Porzecanski 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Macri 将阿根廷汇率问题归咎于国外不利因素的发展，这在投资者看来是空洞的。投资者们可以看到，Macri 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进程有多缓慢：自 2015 年以来仅减少了占 GDP 的 6%；可以看到阿根廷的债务规模有多大：仅仅几年时间，Macri 政府就借债了约 1000 亿美元；可以看到 Macri 政府的央行在试图降低约 2% 的月通货膨胀率时有多么的胆小。

另一个原因是，Macri 政府很快就会发现 IMF 的任何贷款都会附带严格的条件。IMF 在 2017 年 12 月的“Staff Report for the 2017 Article IV Consultation”（《2017 年工作人员关于条款 IV 咨询的报告》）中为阿根廷制定了经济政策建议。它呼吁阿根廷在财政赤字方面采取更为果断的削减措施——特别是削减政府开支。为了支持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吸引私人投资、增强国家竞争力，进行“不可或缺的”供给侧改革。

这些都与 Macri 总统以渐进式方法处理民粹主义前任留下的经济雷区的战略不符，并会因此使得他陷入政治困境。

《经济学人》认为 Macri 干得不错。过去 18 个月中，阿根廷经济增长率都在 3% 左右，政府已经结束了费尔南德斯时期大部分的经济扭曲。Macri 政府通过提高能源和运输价格，逐渐削减了财政赤字。中央银行的偿付金额只占 GDP

的 1%。政府通过发行债务以换取稳定经济的时间。但问题在于，稳定经济的时间比政府希望的要长，投资者也越来越不愿意借钱给阿根廷。政府试图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削减财政赤字并保持经济增长。然而，同时做这三件事是困难的，世界经济变化也正在使 Macri 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Matias Vernengo 认为 Macri 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佳。阿根廷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由于比索持续贬值，增长率一直低迷。Vernengo 认为，Macri 的政策基本上与 Menem（和他的财政部长 Cavallo）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同，除了固定汇率制度这一点以外。原本的目的是通胀目标加灵活汇率的组合可以像 1990 年代“兑换时代”那样维持价格稳定，并且不会导致 2001 至 2002 年收支平衡崩溃的问题。然而结果却是出口没有增长，而进口大幅增加，结果不得不依赖外国借款来缩小差距。

---

本文原题为“Argentina’s Troubles”。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为 Bruegel 附属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宏观金融经济学、中央银行、欧盟机构和政策制定。本文于 2018 年 5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中国 17 年来经常账户首次逆差意味着什么？

Nicolas Moës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经常账户 17 年来首次出现逆差，这再次提醒着我们，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正在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本文总结了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看法。全文如下：

经济学家 Timothy Taylor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每季度都会发布各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情况。所谓经常账户盈余，是指一国服务贸易的净出口总额、资本净流入、以及净国际转移支付（如国际援助）之总和。根据他的测算，中国 2018 年一季度经常账户出现了 2820 亿美元的赤字，这在过去十七年来还是第一次。这既是中国过去几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果，也反映着中国对进一步扩大进口的需求。Timothy Taylor 指出，经常账户的赤字可能会使得中国政府在贸易战上处于不利地位，但他同时也指出，考虑到中国国际贸易的周期性，中国在 2018 年全年的经常账户仍有可能保持盈余。

不过，这一数据在学界仍有争议。国际关系研究院的 Brad W. Setser 认为，上述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状况的测算是 inaccurate 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本年度的经常账户是否能达到盈余，还取决于包括国际油价和中国对大宗进口商品的具体政策在内诸多因素的影响。此外，他还认为中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倾向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自 2015 年以来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如果这些政策被取消，中国经常账户的颓势可能迅速得以改观。最后他补充说：“中国在制造业产品出口上保持的盈余依然冠绝全球，这无疑为我们在对中国经常账户继续保持盈余提供了相当的信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 Nicholas R. Lardy 在今年 4 月的一次发言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诚然，中国 2018 年一季度的经常账户状况较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显著恶化，但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扩大了进口，而非减少了出口。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将达到 6.8%，更为喜人的是，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还要更高。此外，中国的服务业近年来在 GDP 增长中的贡献显著上升，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稳健。因此，中国今年一季度的经常账户赤字仅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贸易政策的变化，而不应当被解读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信号。

Kent Harrington 近日也为辛迪加计划（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中国近年来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显著增强。2015 年，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进口总量中占到了 21%。此外，中国也是其大多数邻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更令人惊讶的是，透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与多个亚洲及拉丁美洲国家达成了贸易

与投资协定。如今，对于拉丁美洲 60% 的国家，中国已经名列其最大出口对象的前五强名单。

对于中国的上述成就，学者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Kent Harrington 批评中国采用了“掠夺性的贸易政策”，而哈佛大学的 Dani Rodrik 则为中国政府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如今国际贸易秩序越来越不稳定，众多团体都在试图挑战现行的全球贸易体系。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试图塑造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天经地义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美国在一百多年前同样做过。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国际贸易使得数亿人口脱贫，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这理应得到正面的评价。

Barry Eichengreen 则从更宏大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新角色。他指出，随着中国海外贸易和投资的持续增长，以及中国政府的努力推广，人民币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国际结算，这将动摇美元的统治地位。他还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使得中国有机会在非洲和东南亚获取更多战略资产（如海外港口），从而保护其贸易航线，并增强其软实力。最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得其更多国家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这也对西方世界在软实力上的领先地位造成了威胁。不过，他补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制衡和纠错机制，这意味着中国长期发展的稳定性尚存较大风险。

当然，除了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外，中国角色的转变对其他领域的议题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Martin Chorzempa 近日就撰文分析了中国是如何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赶超美国的——政府的支持与宽松的监管环境。早先，哈佛大学的 Laboure, Zhang 和 Braunstein 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见解，他们将中国在互联网金融上的成功归结于用户对隐私的漠视、巨大的国际市场、以及与海外对手相比有利的竞争地位。不过，他们也认为，中国有限的理财与投资渠道可能限制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显然，中国已经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中国也更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其经济影响力。不过，尽管各界对前者少有争议，但后者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顾虑。著名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 就认为，中国与美国近期达成的一项协议，本质上是在贿赂并游说美国政府允许中国的科技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上个月，彭博社在一篇编辑部文章里总结了中国对西方世界威胁最大的两项政策：一是大力发展军事科技、二是对国际规则的漠视。彭博社的 Michael Schuman 也认为，中国政府经常在国际竞争中采用偏向本国企业的歧视性政策，这使得许多西方国家的企业非常不满。

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Nicholas R. Lardy 发现，2017 年，中国在海外购买知识产权方面的支出同比增长

了约 2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Martin Wolf 近日也总结了他近年来与中国高官、企业家和学者们进行的多次对话，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高度肯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积极作用，并已对西方模式逐渐丧失信心。此外，尽管中国致力于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但中国并没有任何称霸世界的野心。

---

本文原题为“China’s New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本文作者 Nicolas Moës 是 Bruegel 研究院创新与政策领域的研究助理，Nicolas Moës 拥有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本文于 2018 年 5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中国的数字经济市场

Alicia Garcia Herrero 和 Jianwei Xu /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在中国数字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的强势崛起下，中国引领了全球数字创新的风潮。但是中国数字经济市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本文运用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中，创造的附加值和就业岗位为衡量指标，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与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数字经济水平进行对比。编译如下：

据国际数据统计表明，中国在出口数字产品和服务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密集型的高速经济增长体，中国在数字经济市场中的潜能真的完全释放了吗？中国数字经济市场的规模有多大？和其他国家相比的表现如何？

### 1、研究背景

关于数字经济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G20 领导人峰会和其他国际论坛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组织也展开相应测算工作。中国也通过国家统计局(NBS)开展一项旨在测算中国新经济的项目。

通过国际测算方法显示，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净出口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占全球 ICT 产品出口份额的 32%。而通过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推算，中国 ICT 产品出口价值占全国总出口价值的 26%。而 ICT 在中国服务出口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约占全国总出口服务的 40%，所占份额高于日本和美国，但是低于菲律宾，以色列，巴西，瑞典，德国和法国。这使得中国在全球 ICT 服务出口份额中仅占 6%。

尽管在以上统计口径中，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出口体量庞大，但是在用数字经济市场中产生的附加值作为衡量指标时，中国在 ICT 出口产生的附加值仅占 ICT 出口总价值的一半，在全球 ICT 出口的股份下滑到 11%。其中的原因是，尽管一些数字产品在中国集装和出口，但是产品制造过程中的部分附加值却在非中国地区产生。

### 2、已有相关测算

在 2016 年的 G20 领导人会议中，中国支持《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一系列广泛活动，包括将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作为生产活动的重要因素，有效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实现生产效率增长的驱动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但在实际测算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过程中，却难以达成共识。中国主流观点认为，OECD 国家采取的以部门为单位的数字经济测算分析可能忽视一个事实，即部门中仅有部分产品与数字经济相关。这也是中国开始在部门中收集产品层面数据的原因，因为国家统计局认为，在产品层面上对国家数字经济进行测算，是一个更好的口径。

同时，国家统计局为了响应国家发展战略重要部门，扩大新经济相对规模的策略，开始对中国新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在 2017 年 8 月发布的第一篇新经济报告中，国家统计局运用包括直接测算法，附加值比率推算法和比例法在内的三种方法，对新经济产生的附加值进行测算。尽管有官方测算方法，国家统计局还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从用户的角度构建一个数字经济指数，包含五个指标：宽带网用户数量，移动网络用户数量，移动网络办理业务量，电商交易量和网上零售量占总零售量份额。数据统计表明，中国在 2015 年的数字经济增长高达 40%。

除国家统计局外，财新网—中国商业与金融新闻机构—也发布对数字经济的独家测算方法。其测算包含两个指标：高端软件发展和新信息技术服务。根据财新网指数估算，中国数字经济在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4 月间增长高达 176%。

### 3、本文测算方法

尽管已有测算指数和 OECD 发布的，使用贸易数据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析大方向一致，但对于 ICT 部门的测算却与 OECD 发布标准不同。此外，我们依旧无法估计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

本文运用公开可得的官方数据，从与 OECD 测算方法可比的角度的角度，对中国数字经济进行测算。我们主要依赖于两组数据——中国 2012 年进出口数据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来对中国数字经济附加值和激增就业量进行估算。

然而即使有以上两组数据，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依旧存在困难，因为中国对行业分类的标准不同于国际标准 (ISIC)。为了使我们的估算更接近 OECD 的标准，我们选取两类最符合 OECD 定义的指标来衡量数字部门：

- 数字制造商品包括：办公、计算与编程设备，电子通讯设备，测量装置，电子光学产品，电脑
- 数字服务包括：电子讯通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

经过测算，中国数字经济附加值占总附加值份额为 4.8%，产生的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 2.8%，低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附加值份额 6%，就业量占比为 3.7%），远低于日本水平。这个结果与对中国 ICT 出口所产生附加值的测算更

加契合（ICT 出口附加值仅占出口总价值的一半左右）。根据我们的估计，中国似乎生产更多的 ICT 产品，但是由此产生的附加值和就业岗位并没有同比增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数字部门在中国没有同步发展，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并且全国各地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中国 2016 年的人均 GDP 为 8123 美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43%。如果我们只估算城市地区由数字经济带动的就业量，就业量占比就提升为 4.53%，显著高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中国数字部门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制造业导向型。电子设备的生产制造所带来的附加值是中国 ICT 部门总附加值的 55%，服务带来的附加值仅占总附加值的 45%。这表明中国数字经济还是过于依赖制造拉动，未来中国数字经济转型需要大力发展 ICT 服务，成为服务导向型国家。

然而，中国 ICT 部门生产率比平均生产率高出 1.8 倍，高于 OECD 平均水平（数字部门生产率比平均生产率高出 1.6 倍）。换言之，数字部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于对 OECD 国家经济的贡献。除此之外，低度的 ICT 发展也造成中国国内数字部门的不平衡发展。北京、上海和广东在 ICT 就业量占全国比重上分别占到 8.4%，8.2% 和 7.9%，这几乎超过所有 OECD 主要成员国水平。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比如西藏和贵州，ICT 就业量占比低于 0.1%。

#### 4、中国数字经济的近来发展

上文分析得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但对于测算结果一个很明显的挑战是中国 ICT 部门的附加值为 2012 年数据，但中国数字经济增长速度迅猛。因此我们运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对 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 ICT 部门附加值进行推算。

推算结果表明，在 2013 年到 2016 年间，中国 ICT 部门附加值增长率稳定在 10% 左右，但中国 GDP 的增速从 7.8% 下降到 6.7%（见图 1），应证前文中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驱动的观点。如果我们用 2012 年 ICT 部门附加值作为基数，在 2013 年至 2016 年保持同比增速，ICT 部门的附加值规模将有显著提升。在 2016 年 ICT 部门附加值占总附加值比将达 5.6%（见图 2），但依旧低于 OECD 国家在 2012 年平均水平（附加值占比 6%）。

图1 中国ICT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Figure 1 ICT Growth rate versus GDP growth rate for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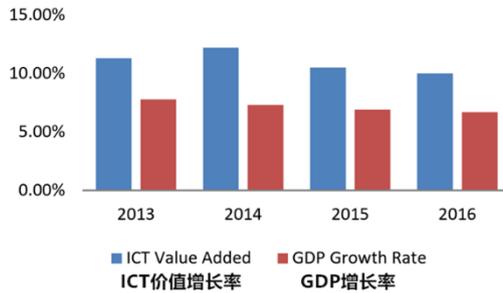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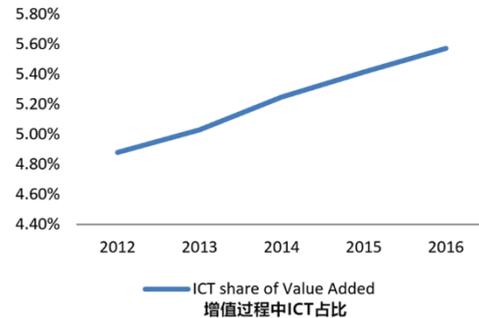


图2 增值中ICT占比

Figure 2 ICT share of Value-added



## 5、结论

本文在简要回顾已有测算后，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提供新的测算方法。在采用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测算指标后，文章计算出 ICT 部门附加值占比和刺激就业量占比，并且和 OECD 国家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在这两个测量口径下，中国数字部门的发展水平仍低于 OECD 平均水平。即使 ICT 制造部门增长迅速，但经推算得出的，中国最新年份的 ICT 部门附加值占比仍旧低于 OECD 同比的平均水平。换言之，中国依旧在追赶发达国家 ICT 发展水平。

但是中国数字经济有强劲潜能。首先，中国有很大体量的农业经济，考虑到城市地区的数字化水平远高于农村地区，中国数字经济占比会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化而增加。其次，中国数字部门生产率高于 OECD 平均水平，展现了数字经济在拉动中国经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最后，中国各地区发展失衡，如果 ICT 部门快速发展地区的增长速度能够外溢到 ICT 部门欠发展地区，那么新一轮的高新科技发展浪潮将在不久的将来席卷而来。

---

本文原题为“[How Big Is China’s Digital Economy?](#)”。本文作者 Alicia Garcia Herrero 为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Jianwei Xu 为布鲁盖尔研究所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8 年 5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张涛：如何确保亚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策缓冲、货币政策框架与金融包容性

Zhang Tao/文 申劲婧/编译

导读：对于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亚洲各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IMF 副总经理张涛在第五届 MAS 亚洲货币政策论坛上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亚洲需要共同努力来建立能够应对意外风暴的政策缓冲机制，警惕通胀并加强货币政策框架和中央银行的沟通，并且努力实现更广泛的金融包容。编译如下：

目前，相关人士重点关注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实力的条件下，IMF 对亚洲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的看法。张涛认为，我们应该从危机中吸取的一个核心教训就是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实质上，自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它作为工作的重点，一直强调建立经济耐受力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要警惕面临潜在冲击时的脆弱性。在演讲中，张涛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及其应对，即：

- 对于意外冲击，亚洲准备得如何？
- 该地区近期通胀趋势意味着什么？
- 为什么亚洲需要深化金融融合？

### 政策缓冲

首先讨论的政策缓冲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

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和亚洲经济的短期前景依然强劲。IMF 最近预测今年和明年全球增长率将为 3.9%，对此大多数人都并不陌生。但是最近几周在某些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不确定性也使大家都意识到，风险依然存在。这再次引发人们对亚洲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加剧，甚至下一次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忧。当然，随着央行开始小心翼翼地走上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近年来类似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关于亚洲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因素，IMF 的信息十分明确：他们一直呼吁决策者重建货币和财政缓冲。举例而言，这种政策方法对避免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就是至关重要的。亚洲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提高抵御能力的防御措施，尤其是加强了对灵活汇率制度的依赖。总的来说，该地区抵御冲击的能力已然增强。尽管如

此，另一些缓冲能力却在减弱。以下是几个例子。

首先，用于评估储备充足率的指标显示，亚洲储备金覆盖率在全球危机之前就已经下降，但远高于亚洲危机之前的水平。尽管如此，储备充足率仍然较高，并高于大部分地区。

其次，平均经常收支账户余额比 2007 年略低。但是某些特定国家缺口可能过大。

第三，自 2007 年以来，亚洲的外债大幅上涨。甚至在此之前、亚洲危机之后外债就已经开始大幅增加。

第四，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 2007 年的 46% 上升到 59%。财政收支也在恶化，目前的平均财政赤字占 GDP 比率为 1.1%。而在此之前，平均财政都处于盈余状态。

最后，全球危机以来最显著的变化也许是企业和家庭债务增加。

众所周知，IMF 一直向全球会员提倡未雨绸缪。对于亚洲而言，这意味着决策者应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财政和货币缓冲以及在必要时采取宏观审慎的措施。无论如何，底线是明确的：想拥有强大的抵御能力，亚洲仍需要努力。

## 亚洲的通货膨胀

加强缓冲政策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持续警惕通货膨胀。最近 IMF 关于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展望主要有三个发现：

首先，导致低通胀的主要是临时性因素，包括输入性通货膨胀。数据估计表明，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进口价格疲软是导致亚洲一半左右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低于目标的原因。

其次，通货膨胀过程变得更加依赖历史。一般通胀预期都有相应锚定，尤其在亚洲发达国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济体。尽管如此，近年来，预期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通胀率受历史的影响更大。

第三，通货膨胀对失业率的敏感性下降。亚洲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全球价值链和自动化整合似乎导致了菲利普斯曲线趋势变平，而这些因素削弱了劳工的议价能力。

IMF 的调查显示，随着商品价格上涨和货币政策正常化，由于未来发达

经济体低通膨的情况逆转，亚洲通货膨胀率可能上升。此外，区域货币疲软也可能成为一个推动因素。另一方面，目前技术变革对价格的长期影响还不明晰。

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对输入型通胀保持警惕，灵活汇率也许可以提供一定隔离保障。各国应当加强货币政策框架，促进中央银行对外沟通，以加强预期对推动通货膨胀的作用，从而将通胀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

## 金融包容性

通常认为低通胀对低收入家庭有利。但是还有一个与穷人有关，也和亚洲经济前景有关的问题，那就是金融包容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减少收入不平等有助实现持续增长。因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行动促进金融包容对于减少贫困至关重要。

金融包容性也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一些研究表明，金融包容性增强了利率渠道有效性，使货币政策成为更有效的工具。

亚太地区各国在扩大金融服务渠道和改善金融产品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包容性与其他地区一致。但亚洲的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显示出更广泛的金融包容性。尽管如此，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性别差距仍然很大。

IMF 的研究还显示，亚洲地区不同国家在金融包容性上的差异比其他地区更大。虽然一些亚洲国家已走在金融包容的前沿，但其他一些国家却只能提供基本金融服务。最大的差距在于 ATM 或正规的银行服务的可达性。

包括电子银行、手机银行和移动货币在内的数字金融服务最近在许多国家扩展。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蒙古都增长显著。在太平洋岛国，地域分散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障碍。有趣的是，在移动银行业务领域，大多数亚太国家都落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虽然亚洲在传统银行业务基础设施方面处于领先，但它远远落后于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的移动交易。在这些国家，超过 70% 的人口使用手机银行服务。

显然，深化亚洲金融包容性的潜力巨大。各国可以采取几个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加强信贷局，资产登记，支付系统和小额信贷机构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将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其次，各国需要分配足够的资源来扩大互联网和手机连接范围。第三，在一些国家，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的自由化将有助于降低成本并

改善服务。

## 结论

总而言之，亚洲需要共同努力来建立能够应对意外风暴的政策缓冲机制。它需要强有力的货币政策框架和中央银行的沟通努力来应对和适应不确定的全球环境。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增强金融包容性可能面临的障碍，并了解技术变革促进金融包容的方式。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可以帮助亚太地区变得更安全。尽管亚洲已经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功，但我们不能将这种成功视为理所当然。

---

本文原题为“Policies to Ensure Asia’s Sustained Economic Success”，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经理张涛在亚洲货币政策论坛上的演讲。本文于 2018 年 5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敌我外交时代的能源政策

Sarah Ladislaw/文 唐雪坤/编译

导读：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外交中保持一种亦敌亦友的姿态，而一定程度上，能源问题是其在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中的重要部分。本文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新外交时代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动和特朗普政府的新能源政策。编译如下：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确定本国的立场。盟友国家觉得自己像对手一样被对待；而对手国家却能从表现得像盟友般行事的背后发现潜在利益，尽管这之中可能会有一些“过激”言论。这种“亦敌亦友”的动态变化是因为对特朗普政府来说，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准则长期持有的信条对特朗普没有多大影响，他反而偏好于更个人的决策方式。资产和负债都可以不受到外交政策规范和期望的束缚，一方面，这可以创造新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机会，来解决当下传统外交政策分析家认为可能存在的或是以前无法解决的那些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倾向于激怒盟友、赞扬和保护对手的做法，使得美国外交政策在一系列安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的潜在走向都令人费解。

所有这些现象对能源行业都十分重要。能源行业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交易产品和服务的业务、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以及涵盖了遍布各大洲长期项目和长期资本投资的能源投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能源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议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同“能源主导”政策或更新一点的口号“新能源现实主义”所阐述的那样。但另一方面，它也服从于更广泛的外国政策背景，这让业界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美国能源新思路。

首先，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投资于美国或是与美国进行贸易是一个迎合这届政府的可靠途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同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以推迟特朗普政府威胁将要启动的针对不公平的中国补贴和知识产权政策的贸易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怎样，中国本就想要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可关于不公平的中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种商品出口导向型的外交方式有点奇怪，因为无论是可出口能源的开发或是投资的商业条款，总的来说都不是由美国政府决定的（尽管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关税来间接影响）。然而，这对中国来说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已经习惯于和有政府协议背书的国家进行重商主义的贸易。

其次，那些寻求在与美国立场不太一致的国家开展业务的公司都需要谨慎行事。这里包括伊朗、朝鲜、古巴、叙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较为明显的国家，

但也包括一些不太明显的，如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美国政府一再表明，一个国家在进行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时，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都可以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墨西哥的等级制度问题为例：移民、边界墙、钢铁关税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外交政策背景下都是相互关联的，大家能感受得到，与墨西哥的能源贸易可以作为谈判其他问题时的筹码。在某些方面，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如此，但政府谈判方式的自由性及其同时斡旋的大量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使得谈判的潜在背景变得非常复杂。令人奇怪的是，就上述墨西哥的例子而言，美国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来支持墨西哥能源部门投资的增加，虽然这是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期待的，同时也是支持北美能源贸易发展的方式。

第三，多边努力来推动能源议程的方式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似乎特别令人担忧，因为政府表示倾向于双边交易而不是通过机构进行交易，还因为负责管理现有多边交往的组织长期人手不足。在先前政府时期，新的多边集团已经建立起来，这些集团为美国能源议程上各国政府之间的期望奠定了基调。尽管能源部长里克佩里和内政部长莱恩辛克都与多个国家在共同利益领域签署了相互理解的书信，但总体而言，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一个有着明确的实施计划的一致战略来支持具体的议程。议程中最有前景的领域是清洁煤技术的研发（碳捕获和碳封存等）、核能和天然气等——所有美国希望向其他国家出售的能源。许多多边机构和集团试图调整其组织的议程来保证美国的参与度，但现在这些努力似乎更多地被设计成为了维持某种成员身份现状做的努力，而不是一种约束或影响美国的主要方式。

第四，“亦敌亦友”政策正在改变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和实际的地缘政治路线（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永久性改变）。整个中东地区、整个亚洲以及俄罗斯影响范围内的任何地区对能源行业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些地区的基础安全环境都面临着全新的、更紧张的现状，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未来可能重新实施的制裁，大部分伊朗专家预测，伊朗将在整个地区升级其代理活动。考虑到最近从也门向沙特阿拉伯出口的导弹数量，以及以色列对于在叙利亚日益增强的伊朗势力和力量的深切担忧，这些紧张局势都不应该被忽视。这一点也使得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了别的外交政策调整。某些欧洲领导人已经承认，他们不能再依靠美国来达到曾经辉煌时期同样的高度，他们也正在更大范围的邻国寻求帮助来填补这个差距。由于美国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对朝鲜可能实施全新的安全维护措施，同时伴随着亚太地区各国重新评估其安全优先事项，日本和中国也重新建立联系。如果美国继续退出 JCPOA 的举动并且不能找到补充协议来稳定更广泛的国际秩序，伊朗将会因为贸易和外交

原因比以往更加需要中国和俄罗斯，更不用说印度和土耳其了。受到能源市场需求以及尽可能深化和加强国际联系的愿望的驱动，商业性外交（包括能源在内）很可能是这次政策调整的一部分。要清楚的是，这些国家很多并不是天然的盟友；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国家被描述成互为“亦敌亦友”关系也是恰当的。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稳定和可预测的美国的领导，这些国家就需要找到潜在的其他选择。

尽管这种新的外交政策难以理解也更难以回应，但并不意味着各国都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事实上，一种新的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这样的模式在关于未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和什么是可期的这样的问题上能够提供一些线索。首先，政府从根本上是由国内政治驱动的，这可以成为政策行为的出发点。例如，一些重要的外交政策公告都是在不好的国内新闻周期（美国政治中曾经真实存在）期间发布的，而不是在一些和国际问题相关的日期中。竞选承诺也会影响决策的内容和方式（公平地说，最近的许多政府都是如此）。由于候选人特朗普在其竞选道路上的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十分尖锐，这样的承诺就转化为了既具戏剧性又粗暴的外交政策公告和示威。其次，政府的政策声明中很少有确凿的结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似乎确立了发起谈判的目标。因此，该模式目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强硬且十分令人震惊的现状、强制进行谈判以及编译一份挑战列表（在合理且可能的条件下）。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些谈判是否能够成功达成，又或者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比赛，目的是将正在进行的谈判引入正轨（就像目前似乎正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和朝鲜之间发生的谈判一样）。

当前，世界各国一直在作为美国新外交政策的减震器——安抚我们的强硬措辞，而不是对我们的非常规策略反应过度，以及试图维持美国曾经捍卫的秩序。但值得思考的是，各个国家是否会厌倦充当这种减震器的角色，或者在某些时候其他国家是否会真正以“亦敌亦友”的方式来排挤美国。一些企业和政府会发现这种相对混乱的环境正是谨慎和避险的时刻，而其他人则会利用这一以前无法获得的机会。

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动态下，能源是从属于其他政治目标（如安全、贸易、经济 and 地缘）之下的，除非石油价格上涨或是美国石油供应和价格政策出现问题。上周的情况就是这样，汽油价格上涨加上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到来，引发了一波政治风浪和新闻媒体的报道，这一系列报道是关于欧佩克（OPEC）在管理石油价格上扮演的角色的，这一点特朗普总统几周前在推特上曾表达过不满情绪。相应地，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则宣布可能会通过增加石油桶量以调控石油的高价格，但据报告，这一举措在较小的欧佩克国家中并不受欢迎。自从进入高油价的紧张

时期，美国通常就开始考虑全球能源贸易体系的价值。这个体系长期以来被美国所拥护，并声称这能共享全球利益且在全球供应链紧张时通过相互依赖而获得抵抗力。在市场紧张和石油供应中断的时候，美国在历史上曾通过和盟友协调来增加市场上的供给、采取措施提高效率，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减少应急储备。在一个亦敌亦友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所有的支持和举措都受到各种持续进行中的不确定谈判的影响，希望这种复杂性不会适得其反。

---

本文原题为“Energy in an Era of Frenemy Foreign Policy”。本文作者 Sarah Ladislaw 是美国 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兼董事，同时也是能源和国家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负责领导 CSIS 在能源政策、市场和技术分析方面的工作。本文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发表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朝鲜：川普能创造历史吗？

Ralph A. Cossa /文 刘铮/编译

导读：在4月27日举行的首脑会晤上，朝韩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开启了半岛和平的新旅程。随后，举世瞩目的“特金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对于当前的半岛局势，各方态度如何，“特金会”的举行又带来怎样的成果，本文进行了简要的探讨。编译如下：

短短几个月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从一个国际社会弃儿成为最受他国欢迎的伙伴。自从新年伊始他向韩国抛出和平的橄榄枝以来，金正恩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过两次会谈。与此同时，金正恩还在准备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首脑会晤——这将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与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之间的首次会面。会面可能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据报道，由于朝鲜领导人对中国不够尊重，习近平主席此前一直拒绝与金会面。如此突然转变，似乎是害怕在这场朝鲜的“和平进攻”中被边缘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很快也表示期待——更确切的说是急切盼望，与金正恩会面。普京还会落后吗？此外，安倍还专程赶往华盛顿，试图确保美日之前达成的关于对平壤采取强硬路线的共识不会被破坏。目前尚不清楚他此行的目的是否达成。据报道，在特金会面之前，安倍还想再次与特朗普会面。对日本而言，再多次的重复确认也不为过。

特朗普总统在促使朝鲜的外交转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还为时过早）。毫无疑问，他早先的“火与愤怒”威胁和“极限施压”政策推进了当前的外交进程。然而，这些政策效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战争的威胁或者愈发严厉的制裁把金正恩吓倒了吗？还是说，文在寅总统出于对未来发生冲突的担心，才愿意向金正恩提出合作？又或者，这只是朝鲜的一个计谋，等着文在寅和特朗普上钩？我担心是后者，但只有时间会说明一切。

当然，朝鲜坚决否认他们做出这样的外交姿态转变是由于所谓的制裁和压力。平壤方面认为其自身具备“强大的威慑力量”，因此它在外交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强者而非弱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怀疑者也认为，文和金在《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中的声明——“朝韩双方将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并不能说明朝鲜已经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关于朝鲜半岛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CVID）的要求。相反，朝鲜声称，朝鲜半岛无核化首先要求

全球裁军。平壤方面的长期立场是，它愿意与美国以及其他核大国进行全球裁军谈判，这一表态基本上将朝鲜作为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合法化。

一些人认为，最近朝鲜公开拆除丰溪里核试验场的消息展现了平壤方面的诚意。然而，相比于无核化承诺，我更愿意把拆除试验场看作是一个“核试验完成”的声明。《劳动新闻》（朝鲜劳动党的机关报）评论称，“拆除核试验场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表明了朝鲜政府爱好和平的坚定立场，以及为了完全禁止核武器试验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既然“宝剑”（指核武器）都已准备就绪，核试验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了。金正恩似乎已经准备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特朗普又会如何应对呢？

正如闪电式进行的第二次“文金会”所透露的那样，文在寅总统迫切希望“特金会”能够如期举行。他被描述为这两位难以捉摸的领导人中间的“调停者”或“促进者”。尽管文为协调各方做出了最大努力，但他并非持中立态度。因为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会谈结果对韩国来说利益攸关。事实上，就算没有核武器，朝鲜也会给韩国带来极大的威胁，而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为韩国提供支持——这也是韩国想要促成这场谈判的原因。

毫无疑问，文正在努力建立起联系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桥梁，但这座桥梁需要双方都走得通。金正恩可能会利用文对和谈的迫切愿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华盛顿方面并没有向文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如果关于韩国没有收到特朗普取消会谈的通知的报道是事实的话）。在做一个调停者和沦为朝鲜的同谋之间，文必须拿捏好分寸。我担心，华盛顿方面更倾向于认为文是后者，这也是出于对文在寅作为改革派领导人的怀疑。事实上，文只是正在做一件任何韩国领导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

质疑之外，“文金会”也带来了谨慎的乐观主义情绪，尽管重点需要放在“谨慎”一词上——就像任何涉及平壤的事件所需的那样。《板门店宣言》中一条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声明实际上非常重要：“朝鲜和韩国同意积极开展包括朝韩和美国的三方会议，或涉及朝韩、美国和中的四方会议，以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推进停和机制转换，并建立永久和稳固的和平制度。”

朝鲜过去曾主张，任何和平条约都应在美国和朝鲜之间，或者至多在美国、朝鲜和中国之间。韩国通常被平壤方面排除在外。从表面上判断，这一条声明说明了平壤方面现在准备与华盛顿和首尔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而北京的参与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平壤方面确实是这样的想法，那将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突破。关于文在寅总统可能会在“特金会”结束时出现在新加坡，

并宣布韩朝 68 年对立局面即将结束的传闻也印证了这种可能。平壤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再甜蜜。同时，自从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保卫自身和美国部队免受朝鲜导弹袭击以来，韩国一直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任何的停战声明，真正影响的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美韩联合司令部”是否应继续存在。前者在某种意义下可能会被解散，而只要朝鲜有能力威胁韩国，后者（以及美韩联盟）就应该存在——和平的意图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军事实力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据文在寅总统自己承认，“文金会”不仅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为即将到来的“特金会”奠定了基础。在以往这样类型的会晤之前，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总统通常会要求提供一些可交付的成果，批评者声称这给金正恩带来了不应得的可信度和声誉。如果我们在过去一年左右没有得到别的东西，那是因为特朗普总统不是你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美国领导人。这场峰会唯一可能超出预期的一点是：它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这场灾难的形式可能是特朗普愤然离席，在谈判桌上留下极小的余地——除了更加极端的施压（这很难维持，特别是当美国被指责应为会谈的失败负责时）或是某种类型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特朗普被忽悠达成了某种金正恩满意的结果——他的真正目标不是无核化，而是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摆脱制裁，获得国际公信力和国际地位。

同样的担心也适用于特朗普总统。最近的人事变动，例如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调任国务卿，以及福克斯新闻网首席“战争贩子”约翰·博尔顿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确保了兩名强硬派人物会关于金正恩的任何行动向特朗普提供意见。我们很容易猜到他们会做出警告，不过难以预测特朗普是否会听取这些建议。例如，博尔顿和蓬佩奥以及大部分的国家安全机构都认可未来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进行军事部署的重要性，并且警告说不能通过谈判撤出武装。传言（有推文印证）表明特朗普可能更倾向于打军事部署的牌。任何涉及军事级别的讨论都必须有韩国参与，裁军以及其他军事互信的建立都是南北需要共同讨论的话题。

尽管仍需保持谨慎，但让事态停止变糟是其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就算这是我们对于即将举行的“特金会”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那至少也不是一件坏事。考虑到平壤方面的领导体制和特朗普善变的风格，如果希望实现真正的半岛和平，那么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就一般原则和总体目标达成一致。不过，尽管大多

数的高层会面通常意味着一段外交进程的结束，而“特金会”最多只是一系列谈判的开始。

---

本文原题为“North Korea: Can Hope Triumph over Experience?”。本文作者 Ralph A.Cossa 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本文于 2018 年 5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充分利用朝鲜的复杂动机

Patricia M. Kim/文 丁丽伟/编译

导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5月10日宣布，他期待已久的与金正恩的会面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金正恩近期的外交政策突变备受世界关注，本文作者认为，金正恩这种转变背后的动机是多样化的，但美国应该充分利用本次机会，引导朝鲜与之达成广泛协议，并且可以考虑进一步发展为两国军事互信与合作。只要朝鲜信任美国，其将受益匪浅。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今天宣布，他期待已久的与金正恩的会面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将标志着在任美国总统首次与朝鲜领导人会晤。

也许在峰会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平壤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如何解释金正恩在核武器项目谈判上突然间的变脸以及他与华盛顿、首尔、北京、莫斯科和东京的匆忙外交接触？他是害怕华盛顿即将发动的军事打击吗？经济制裁——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北京方面前所未有的支持——真的开始起作用了吗？或者这都是金正恩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一部分，首先是建立一个重要的核武器能力然后以一个有利的位置进行谈判。

此外，金正恩打算如何利用这个与唐纳德·特朗普6月份的谈判机会？在他继续秘密推进核武器计划的同时，他是否认为谈判只是一种减少压力的拖延机制？也许他确实是希望通过无核化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的机会？

虽然不可能完全确定金正恩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但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包括“以上所有的猜测”。首先，金正恩无疑希望从特朗普政府的空前压力中得到摆脱。如果特朗普总统关于备选的“鼻血打击”的言论震惊了华盛顿和亚洲的领导人和内部人士，那么这无疑也会让平壤的金正恩及其副手们感到不安。此外，尽管有一场关于制裁有效性的辩论，但中国政府向平壤施压的惊人举动——从减少石油出口到关闭在华经营的朝鲜企业——引起了金正恩的注意，而且肯定影响了在不断增长的制裁下他对生存稳定性的评估。

在谈判的过程中，金正恩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秘密地维持他的核项目以获得双重保障。毕竟，以前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谈判时朝鲜耍过赖。此外，金正恩没有理由不如此行为，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从美国对朝鲜的长期意图到可能威胁到他的政权的国内和地区形势发展。

最后，金正恩似乎也确实想要追求经济发展。几个星期前，在穿越非军事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之前，他发表演讲说，他将放弃同时发展核武和经济的“并进”政策，采用一种“新战略路线”，将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事实上，自从掌权以来金正恩就向他的人民承诺，他将带领他的国家走向繁荣，他很可能认为他必须履约。

总之，金正恩的外交突变是由多种动机驱使的。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白宫要主导韩国、中国和其他地区国家采取一种紧密协调的行动，以充分利用金正恩的意图，同时预防最坏的情况。

首先，作为推动无核化的主要力量，美国必须围绕一个精心设计的路线图联合其他国家，以实现这一目标。尽管白宫誓言要继续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朝鲜采取实质性的步骤实现无核化，但如果韩国或中国过早开始放松制裁或向平壤提供经济刺激，维持经济施压将是不可能的事情。两国似乎都急于启动经济合作，北京方面呼吁华盛顿回应平壤的示好，同时韩国领导人和企业寻求重启或启动各种朝韩项目。

因此，特朗普总统将需要召集他的韩国和中国的同行们制定一项计划，该计划最初包括向朝鲜提供不涉及减轻制裁的奖励，比如加强外交接触和严密监控的人道主义援助。如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金正恩的峰会上所做的那样，显著的经济奖励应该并可以描述一下以激励朝鲜。但各方都应该同意只有朝鲜在做到以下几项要求才能变现该奖励：朝鲜接受严格的核查，在见证下冻结核与导弹试验、研发和扩散，并且承诺避免像以前一样在其他领域（从传统领域到网络）发起挑衅。

只有在朝鲜证明其可以达到这些要求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应该也表明他愿意尽力达成一项和平条约。明确界定相互期望对于防止关键人物间的失望和指责，在这个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美国不能削弱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也不能削弱其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这样平壤将明白它不可能利用华盛顿与其盟友之间不和获益。任何有关减少驻韩美军的讨论在未来都应该无限期推后——只有当朝韩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且长久地和平生活时。

美国也应该非常谨慎地考虑：如果需要的话，它将向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军事让步。白宫应该考虑向平壤提供建立军事互信的机会，甚至或许有一天可以邀请朝鲜参加联合军演，而不是做出让步。尽管现在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如果

考虑到平壤对北京根本上的不信任，以及它希望平衡掉中国的影响，这样的安排将会被证明是互惠互利的。

最后，一旦朝鲜如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迈出无核化的最小一步，美国——以及韩国和中国——应该真正支持朝鲜的经济发展和融入地区，以建立互信并使朝鲜领导人确信无核化是一个有价值的妥协。

随着“特朗普-金正恩”峰会的倒计时开始，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为了将这一历史性的开放转化为与朝鲜的长久接触，白宫面临着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从事先获得韩国和中国的支持，到6月与金正恩仔细地谈判以达成广泛协议。

---

本文原题为“Making the Most of North Korea’s Mixed Motives”。本文作者为 Patricia M. Kim，是斯坦顿核安全成员，研究专长是中国、亚洲、防务与安全、外交和国际组织等。本文刊于2018年5月10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可望而不可及：国务卿蓬佩奥关于伊朗的演讲

Anthony H. Cordesman/文 曹园/编译

导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1 日在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进行演讲，阐述了美国在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后新的对伊战略，并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的 12 项要求。作者认为，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伊朗核计划的范围，并对伊朗政权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没有更多谈判选项和奖惩措施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一无所获。编译如下：

蓬佩奥国务卿对特朗普在处理伊朗问题上的新战略的解释，包含了对伊朗政权的许多指控，但他不仅仅是呼吁对《联合行动计划》进行通常的修改。他实际上要求伊朗停止美国认为具有威胁性的所有活动，并且丝毫不提及任何制裁或其他奖励措施。该演讲意味着伊朗必须在美国解除制裁前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新的协议。

国务卿列举了伊朗政府威胁到美国和盟国利益的所有政策和行动，这些控诉大多数都是准确的，但它们远远超出了范围。该演讲提出了大概 12 个具体要求，每一个都是对伊朗政权的重大挑战。显而易见的是，伊朗将不得不放弃其安全态势的几乎每一个关键方面，以应对这些挑战：

第一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向原子能机构全面说明其核计划，并以可核查的方式永久放弃此类工作。”这要求该政权承认它过去在核活动问题上撒过谎。众所周知，各国很少正式承认他们说谎，特别是在涉及到最高领袖这样的人物的时候。

第二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停止浓缩活动，决不恢复钚加工，包括重水反应堆。”这实际上要求伊朗放弃其在离心机和重水方面的所有投资，这远远超出了核武器计划的范围，而这项投资的确具有正当的民事用途。

第三项要求是，“伊朗必须使原子能机构能够无条件地进入全国各地的所有地点。”这要求伊朗允许原子能机构在今后无限期地进入所有军事设施。

第四项要求是，“伊朗必须结束其弹道导弹的扩散，停止进一步发射或发展具有核能力的导弹系统。”放弃导弹将意味着放弃对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空军的唯一常规威慑力量。

第五项要求是，“伊朗必须释放所有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伙伴和盟友的公民，他们每个人都因虚假的指控被拘留。”这牵涉到伊朗几乎所有外国囚犯，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第六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停止对中东恐怖组织的支持，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这份“恐怖分子”名单包括伊朗在中东的大多数盟友。

第七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尊重伊拉克政府的主权，并允许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这一需求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独立的伊拉克政府的关键。

第八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停止对胡塞民兵的军事支持，并努力实现也门的和平政治解决。”它实际上迫使伊朗在没有任何交换条件的情况下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作出公开让步。

第九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将其指挥的所有部队撤到叙利亚全境。”这要求伊朗从其胜利的大部分战争中撤出。

第十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停止支持塔利班和阿富汗及该地区的其他恐怖分子，停止窝藏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如果伊朗能够保证阿富汗政府赢得战争，或者达成可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很可能是一个可以商议的要求。

第十一项要求是，“伊朗必须结束伊朗革命政府军对全世界恐怖分子和好战伙伴的支持。”这意味着在没有更广泛的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伊朗得放弃对抗美国和伊拉克军队的关键手段。

第十二项要求是，“伊朗必须停止对其邻国的威胁行为——许多邻国是美国的盟国。这包括威胁摧毁以色列，并威胁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射导弹以及扰乱国际航运秩序和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毫无疑问，如果所有这些要求都得到满足，美国及其许多盟友将更加安全。然而，实际问题是，伊朗要在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放弃几乎所有的战略和军事手段。它们可能不像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要求那样过分，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些要求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是不可谈判的。

伊朗确实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示威以及对其在伊朗境外安全开支的担忧。然而，伊朗或美国的许多盟国不可能支持这种做法，除非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提出更多的谈判选项，否则这些要求终将变成一纸空文。

---

本文原题为“Demanding All and Getting Nothing: Secretary Pompeo’s Speech on Iran”。本文作者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研究专家 Anthony H. Cordesman。本文刊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在惊人的选举之后，马来西亚将会改变多少？

Dr Champa Patel & Josef Benedict/文 丁丽伟/编译

导读：5月9日，马来西亚议会选举结束，92岁高龄的前总理马哈蒂尔重出江湖，带领反对派希望联盟爆冷击败国民阵线，赢得议会选举，将成为下一任总理。本文作者认为，马哈蒂尔的胜利是马来西亚民主的一个重要时刻，意味着反对派有可能赢得与长期执政党派的对垒，这将给马来西亚国内及地区国际局势带来一些影响。但另一方面，作为前总理纳吉布的前盟友，马哈蒂尔与前对手安瓦尔的合作，即使给马来西亚带来激烈变革，能否成功也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在一次大爆冷的选举中，尽管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公正划分的选区和缺乏主流媒体的渠道，马来西亚大选中反对党候选人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领导着希望联盟战胜了纳吉布·拉扎克的巫统。

这场胜利显然是马来西亚民主的一个重要时刻：巫统自1957年以来一直掌权，并作为国民阵线联盟的主要成员领导了该国44年。但这也是一场政治权力游戏：前总理马哈蒂尔对他以前的学生纳吉布反戈一击，转而支持他的老政治对手安瓦尔·易卜拉欣——马哈蒂尔打算赦免他受到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为安瓦尔铺平通往总理办公室的道路。

因此，这次选举可能意味着马国内治理、社会和更广地区的重大变化。但这种政治复杂性让人怀疑：这种变化到底会有多激进。

### 让获胜的联盟继续团结在一起

所有的迹象似乎表明，马哈蒂尔和安瓦尔之间的协议将会得到支持，并将得到赦免。一旦被释放，安瓦尔·易卜拉欣可能不得不在一次补缺选举中竞争，首先成为一名议员，然后才能从马哈蒂尔接手。然而，需要持续不断的压力和审查，以确保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而且不会有任何延误。

与此同时，马哈蒂尔需要管理联盟中各党派竞相提出的要求，他们将在联邦政府中争夺内阁职位和其他关键职位。在很多方面，联盟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纳吉布的这个共同“敌人”。但是，如果没有了共同的焦点，各党派之间关于如何推进执政的各种要求和分歧，将可能导致政府百日承诺落实的延迟。

其中最重要的将是解决经济问题。纳吉布输掉选举的部分原因是，国民阵线未能解决不受欢迎的商品和服务税的影响——这推高了生活成本，也无法遏制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其在2017年达到了8年来的最高点。

许多人还希望看到反对派将如何处理 1MDB（译者注：1MDB 是 2009 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建立的主权财富基金）的腐败丑闻。马哈蒂尔表示，他并不是在寻求报复，并承诺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但是，希望联盟为了保持信誉，纳吉布和其他国民阵线领导人将需要面对某种形式的问责，以对过去的不当行为划定一条明确的界线。

最后，在国民阵线将会经历一个深刻反思的时期。纳吉布辞去了巫统和国阵主席职位，将权力移交给他的副手阿末扎希。许多人认为，如果巫统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公开承认该党的失败，抛弃种族政治，并且摆脱那些曾赖其而生的军阀。

随着主要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和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现在重新考虑他们在国民阵线中的角色，沙巴州和沙捞越的政党也在跳船，联盟正在瓦解。尽管这可能会受到希望联盟支持者的欢迎，但一个被削弱的反对派对民主巩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 对市民社会和少数族裔的影响

在他们的宣言中，希望联盟承诺废除压迫性的法律，包括一项有争议的“假新闻”法。至少，他们应该从煽动法和印刷、新闻和出版法开始，这两种行为都被用来压制异议，并限制市民社会和国内的媒体。

此外，如果新政府想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处理少数族裔的待遇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少数民族，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的情绪日益增长，而国民阵线的政策越来越倾向于马来人，同时牺牲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这一直是马来西亚种族化政治的一个方面，但面对早些时候的选举挫折，巫统最近更倾向于保守的伊斯兰教，以吸引马来选民。缺乏公开讨论种族和宗教歧视等“敏感”问题的公民空间加剧了这些紧张关系。

新政府已经承诺进行一些改革，但问题仍然是，这些改革是否足以降低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程度。否则，这种支持可能会在长期内动摇。

### 对该地区的影响

希望联盟获胜的象征意义将会激励其他国家的市民社会和民主活动人士。但是纳吉布被前同事和盟友——而不是激进的改革者——与反对派人物合作所取代。

新政府可能会继续坚持其前任强调的重点，例如支持罗兴亚危机等国内支持较高的地区问题。马来西亚一直是该地区最直言的罗兴亚人的支持者之一，但并不一定会继续支持罗兴亚寻求庇护者和滞留在马来西亚的难民。真正的考验将在于新政府是否可以开始弥补这一差距。

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将是新一届政府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联盟开始一个议程：即像“一带一路”相关投资这样的大型项目将被重新审查，以回应人们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担忧。

然而，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四大接收国，马来西亚需要外国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和支持创造就业；那些期望对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彻底重新评估和抛弃的人可能会失望。更有可能的是，一些有争议的项目将继续推进，比如东海岸的铁路线路。

目前尚不清楚新政府的改革议程将会有多激进。如果有变化，风险主要在于，这些改变还不足以解决马来西亚深层次的结构性和文化不平等问题。但是，伴随着摆脱过去的政策的任务，新政府面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在国内推进有意义的变革。

---

本文原题为“After Surprising Election, How Much Will Malaysia Change?”。本文作者为 Champa Patel 博士，是 Chatham House 的亚太项目主管；Josef Benedict，系 CIVICUS 的研究员。本文刊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本期智库介绍

###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http://www.chathamhouse.org/)

###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家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